

《中国古代历史图谱》是本什么书

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

《中国古代历史图谱》被誉为“纸上的纪录片”，是中国第一部以历史朝代顺序，围绕各个朝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制度、军事、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风俗、宗教、少数民族、中外关系等，用文物阐述我国历史的、卷数最多的鸿篇巨帙。这套 12 卷 17 册的大部头，共计使用文物图片 9654 张，用文物展示了中国古代丰富多彩、高水平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。

那么，这部前前后后编纂长达 60 年的书，与市面上现有的大量“图说中国历史”书相比，有什么不同？书中图片的选择标准是什么？在主编张政烺先生拟定的大纲基础上，近 10 年编写的《图谱》有哪些突破？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项目发起人与《图谱》编写者。

问题一：与其他“图说中国历史”类书籍相比，《图谱》在编纂方面有什么不同？

答：第一，《图谱》将图片作为主角，用文物图片讲述历史。《图谱》常务编委、《明代卷（上、下）》《清代卷（上、下）》作者栾成显认为，以往一些“图说中国历史”类的书把图片当配角，图片是插图、配图。而《图谱》中的图片占据每页的中心地位，文字只是辅助说明。

另外，根据《图谱》主编张政烺先生早年定下的方针，书中图片必须大而清晰。1989 年张先生在拟定的出版合同中要求道：“印刷必须清楚，如果图版模糊则为废品，必须毁弃重印。”栾成显说，《图谱》希望用图片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，让

读者在获得历史文物知识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。

第二，《图谱》的内容具有通贯性和全面性。《图谱》常务编委、《隋唐五代卷（上、下）》作者黄正建认为，从纵向看，《图谱》所涉范围从原始社会至 1840 年，涵盖了全部“中国古代历史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图谱》不仅断代齐全，而且每个断代中又有细分，比如以往忽略的“五代部分”就细分了五代十国各自的章节，“只要有确定文物，都予以分别展示”。从横向看，每个断代都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民族、中外交流等十几个门类。

第三，《图谱》具有严谨的科学性，这也是此书区别于以往“图说中国历史”类图书的显

著标志之一。何谓“科学性”？黄正建认为，《图谱》得以完成的基础是考古工作者的成果，书中图片的选择都是在有考古发掘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，必须注有出处，尽可能地交待出土时间、地点，或传承过程，并标注材质、尺寸，附有参考文献。“这一方式是以往图说类著作极少有的，也是从张政烺先生开始就定下的重要学术标准。”黄正建说，“这样的‘科学性’，保证了每件文物都能回溯，也保证了书中所收每件文物的真实可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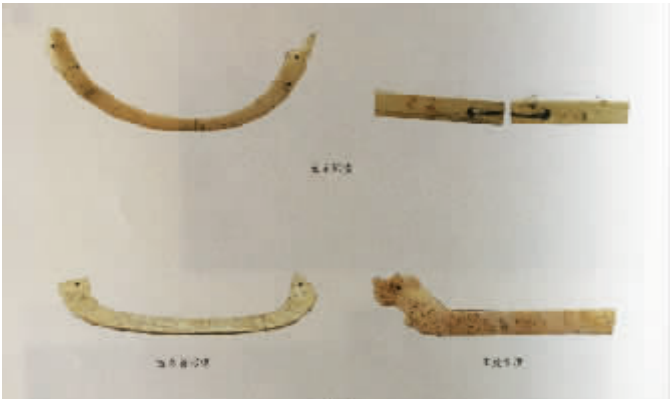
黄正建告诉记者，“科学性”也让《图谱》编写者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——书中很少收录私人藏品，作者选择国外机构收藏的文物时也相当慎重。

他说，由于世界各国所藏中国文物真伪参杂，因此对于这类文物，如果没有确切证据，宁肯阙如。“这也是张政烺先生提出的原则。”黄正建举例道，比如日本正仓院收藏了许多与唐朝同时代的文物，有些可能就来自唐朝，但因为大部分不能找到确切证据，最后没有入选。

在黄正建看来，“科学性”亦是《图谱》的创新之处，使这部书实现了“历史与考古的有机结合”，能够“有图有真相”地用文物照片来展现历史的真实性，其说服力比纯文献更大，“史书流传，可能有人修改、有人瞎编，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，是什么样就什么样。”而且，对读者来说，图片有时比文

字描述更为直观。比如，在《原始社会卷》中，作者罗琨收录了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的玉龙凤璜、鸟首形璜、虎首璜。罗琨介绍，长久以来古史传说中有黄帝“合符釜山”之说，并见于唐碑，但以前从未发现史前的合符。这些 5000 多年前制作的玉龙凤璜、鸟首形璜均由两件组成，结合处有圆孔、凹槽相连。在出土时，两半均已合拢在一起，据研究此为“联姻”的信物，合婚时合拢，死后葬入坟墓的。虎首璜仅存一半，据研究当为军事结盟的信物。“这一考古学的成果为流传久远的合盟信物制度研究提供了某些实

（下转 11 版）➡



5000 多年前的“合符”信物

➡（上接 9 版）

陈绍棣告诉记者，在找图阶段，出版社的编辑帮他做了不少工作。陈绍棣负责的是《春秋战国》（上、下）两册的编写，尽管他是图谱组的元老，但他的找图工作丝毫不比新人轻松。“以前我们拍照用的都是黑白照片，现在要彩色照片，再加上近 10 年考古成果丰富，图片都得重找一遍。”陈绍棣说，他不会用电脑，无法从出版社提供的图片公司数据库里选图，两册书的所有配图都是从社科院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翻书、杂志、考古报告等。待他一张张找出来后，考虑到版权问题，出版社的编辑还得扫描图片后去数据库中寻找对应图片。张宇霖记得，《春秋战国卷》两册书最后共使用图片 891 张，陈绍棣在资料室共查找了 2000 多幅图片。“老先生的学术态度感动了社科院资料室的工作人员，为了方便我们的配图工作，资料室干脆为陈先生和我们编辑专门辟了一个角落，把翻出

来的备用书籍和资料单独码放在一起，以免被不知情的学者借走。”张宇霖说，到了为《图谱》集中配图的时候，资料室里一老一小两个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，时而埋头找书，时而兴奋互换。

张宇霖说，在收集图片阶段，出版社找到了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、湖南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寻求帮助。在了解项目情况后，陈远平提议，可以用出版社的名义给全国各个地区馆藏机构发函，在之后举行的全国文物保护工作会议上，他将函件和资料一一分发给各地区的文物局人员，再以个人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介绍《图谱》的项目情况。出版社很快给各省市文物系统制作了专门的资料袋，里面有函件、《图谱》项目情况说明以及需要对方提供的图片清单，“沉甸甸装了满满一大袋子，陈先生就提着这个大袋子去参加了会议”。一个月后，出版社收到了辽宁、浙江等相关文物单位的回应。随后，河南、吉林、江苏、河北、

湖北、四川等省也都陆续做出了回应，按清单向出版社去大量授权图片，为《图谱》的最终出版提供了巨大帮助。

2016 年，出版社完成了《图谱》12 卷 17 册、9654 张文物图片的编辑工作。张宇霖说：“有一天，我翻了翻我与另一位项目负责人龙昌黄在长沙、北京间往来的车票发现，2015 年我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。”

结语

图谱组的一位成员告诉记者，上世纪 90 年代，他在所里为准备《图谱》的资料一连加了好几天班，最后一天发现“所里无人，自己也觉好笑，现在还做这种事情。由于明年我们要自己赚钱，所以所里上上下下都在讨论如何创收”。

根据资料统计，《图谱》项目前前后后一共获得经费 28 万，共计 17 人参与到最后

的编写过程中，总计出版 17 册书。据记者了解，在现在的项目“市场”上，这样的“行情”低到令人咋舌。

一位对《图谱》项目略有了解的年轻学者坦言，在这个时代，编《图谱》这类书属于“吃力不讨好”，一般学者都不愿接，“有用没人说，有错就被人骂”。他尤为钦佩王曾瑜及编写者们的勇气，感慨于他们付出的心血。

任会斌在采访中感叹，自己的父亲出生于 1950 年代，和《图谱》最初立项几乎同年，如今他们家都有了第三代，而磨砺了半个多世纪的《图谱》一代才刚刚问世。“这究竟是学问的不幸，还是幸运？”60 年、三代人，却好似“弹指一挥”。

“说这套书凝聚了作者几十年的心血，绝非一句空话。”黄正建说，从 1981 年进入历史所工作到去年 8 月在历史所退休，他在 36 年间三度完成《图谱》的文字稿和图片小样。“幸运的是，我看到了它避免成为废纸的一天。”说到这里，

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他说，回望过去的 60 载岁月，细数起来，仅在编纂这套书时去世的老先生就有好几位——《图谱》主编张政烺先生、原《两汉卷》作者朱国烺先生、原《宋代卷》作者朱家源先生、原《明代卷》作者安守仁先生、原《夏商西周卷》作者张永山先生等。再看此次图谱组的成员，项目发起人王曾瑜，常务编委罗琨、陈绍棣、栾成显都在 75 岁以上，曾参加过《图谱》编纂的卢善焕已经 91 岁。

《图谱》项目跨越两个世纪——1958 年首次立项，“文革”期间“下马”；1978 年二度立项，1990 年工作停止，1991 年恢复工作，1996 年被撤项；2004 年再度“上马”，2017 年《图谱》12 卷 17 册终于出版。历数这近 60 年的过往，先后参与的老、中、青三代学者、专家近百人。这不只是一个文化项目。它更像是几代学者、出版人背负使命、前赴后继为共有的理想进行的一次艰难跋涉。